

论辩、问题与道路：批判性本土社会工作之反思

高艺多

【内容摘要】 批判性社会工作研究有助于专业理论自觉、实践自觉和文化自觉的增益与社会工作想象力的延展。当前批判性本土社会工作研究的面向主要涵括了理论论辩、问题诊断及道路建构。理论论辩依然停留于对西方理论论争的观望和重复，对诸多问题化表征进行判断的国际比较对话和戳穿问题本质的能力有待强化，道路设计需要拓展对策略蓝图和具体情境之间适应性的讨论。与西方社会工作批判性思维对实践理性的强调不同，基于历史、现实与情境等因素的考量，本土社会工作批判性思维应迈向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

【关键词】 本土社会工作 理论论辩 问题诊断 道路建构 批判性思维

【作者】 高艺多，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241）

【基金项目】 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包容性城市发展思路研究”（19JJD840001）；上海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社会转型的中国实践与转型社会学的建构”（201701070005E00041）

社会批判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规定了批判事业的主体，社会批评家在公共领域与他人对话，其话语是对公共生活状况的集体反思，其位置既可来自批判对象的边缘（或外部），也可生发自内部。^①社会批判在社会科学中的典型表征即批判性社会学研究，其对象通常是既存的或人们习以为常的现象，批判矛头指向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及其内含的种种张力性机制，但社会学批判性视野瞄准的并非一定是批判者自身深度介入的场域或事件。与社会学的“外部性批判”有所不同，批判性社会工作研究通常内含于批判对象，社会工作者本人深度介入到所批判的场域或事件中，充分调动和运用自我（use of self）的认知、情感和参与式行动，使研究和思考的过程不囿于对具体实务开展与运行现状的经验性、描述性叙事，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更理论化、深层次甚至解构性的检省与反思，从而获得对专业实践更进一步的理解和推动。拓展社会工作研究的批判性，有助



于研究者和实务人士超越个体性困扰上升至公共议题，并采取公共的、结构的和社会的方式完成两者的连接，进而扩展社会工作想象力；使我们不为所谓普遍主义的理论框架所拘囿，以全球化的眼光反思并重构本土社会工作发展道路，增进文化自觉；还能促使我们超越表层现象，深入探寻事物本质，桥接事物形式与内容，努力达致实践自觉和理论自觉的统一。

中国内地的社会工作教育自 20 世纪 80 年代重建以降，从虚心引介到扎根本土再到积极反思，30 年艰辛创业史见证了本土社会工作^②研究的批判性、反思性品格的成长。那么，当前本土社会工作研究中批判性的声音究竟体现在何处？

理念与实践：社会工作研究的基本论辩

（一）社会工作的理念之争

1. 实证主义与解释主义：与社会学共享的争论

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进程与社会学的学科建制化发展相伴而生，其重要理论源泉亦即社会学，因而其理论研究范式也必然受到社会学理论张力的投射。社会工作的理论研究范式是指研究者对其研究主题所抱持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③，实证主义、人文主义和批判主义一直以来是社会学理论中带有强劲张力的理论传统，这些传统在向社会工作演化与传递中形塑了社会工作中实证主义、人文主义和批判主义三大理论研究范式，而对人文性和批判性的强调正是解释主义范式的指归。对社会工作实证主义面相的强调主要是将社会工作定位为实证主义科学，在某种程度上追求自然科学孜孜以求的“规律”，或者借鉴循证医学的理论模式，推崇实验方法并着重开展干预的成效检验，近年来证据为本（evidence-based）社会工作的呼声便是社会工作实证主义面相的关键表征。与实证主义面相相对，解释主义面相下的社会工作注重理论与实践的人文性与道德性的回归，强调结构层面的反思，找回其社会性、政治性，不会一味追求客观性而排斥主观性。纵观西方社会工作发展史，这两种理论范式可以说是彼此纠缠着发展到今天，并且始终无法做到取代彼此，而是共生、共融进而模铸了今天依然富有争议性的社会工作。

2. 理性科学与人文艺术：对专业性质的争论

如果说实证主义与解释主义是现代社会工作理论范式的两个端点，那么关于社会工作究竟是理性科学还是人文艺术的争论就可理解为对社会工作性质的讨论。西方意义上的社会工作最初引介到中国就被赋予“科学”的意义与期待，被视为中国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缓解和解决社会问题的科学方法，迄今都被看作一种专业的助人方法。主张社会工作是理性科学的观点遵守了科学主义的范式、证据为本的理念，彰显其作为理性、科学、专业的助人方法，服务中强调保持清晰的专业界限。而支持社会工作是人文艺术的观点则遵守人文主义的范式，以叙述的方式和关系的视角，服务中充分体现情感劳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作为两个人为建构出的社会科学范式，从来就没有完全分裂，始终处于共生互补的关系，因此本着知识增长与福祉增加的愿景，社会工作中理性科学与人文艺术的面相也应该走向共生与融合。^④

3. 专业主义与管理主义：当代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的形塑

专业主义突出对社会工作者职业自主性的强调，但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受到了管理主义、反专业主义和后专业主义的挑战。近年来，西方社会工作面临着一种普遍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即新管理主义的势头对西方和境外社会工作带来了显著的影响。管理主义在很大程度



上重构了当今的社会工作专业和职业，社会组织的新管理主义取向成为当代西方社会工作发展的显著表征。受到管理主义“3E”即经济（economy）、效率（efficiency）和效能（effectiveness）宗旨的渗透性影响，社会工作专业自主性也呈现日渐流失的趋势。从组织层面来看，境内外社会工作在管理主义的影响下，还表现出政府购买服务等环节更加市场化、机构竞争商业化、组织形式商业化、价值基础妥协化等特征^⑤。目前来看，我国社会工作实践中存在强管理主义与弱专业主义的不均衡状态，实务过程中的管理主义与专业主义的冲突和矛盾，进一步引发了学者们对管理主义与专业主义的争论，进而导致实践中行动者之间大量的张力与冲突，如何应对和平衡这种张力与冲突并使其走向“融合”状态，成为社会服务管理领域一个重要的理论议题。

（二）社会工作的实践之争

1. 对立分歧与多元整合：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

社会工作作为一个多元体系的组合体，涵括了个体治疗、人际改善与社会倡导等多层面实务取向，这些差异化实务取向的背后都有强大的理论背景作为支撑。主张社会工作各种范式之间的对立性、差异性的论者认为，正是因为多元体系中的每一“元”都拥有自身独特的理论假设和干预前提，并发展出了相对完整的介入策略，彼此之间存在专业层面的边界，似乎很难再进行彼此的整合。如果强行整合则要么导致各个特殊性的实务取向“削足适履”，对自身进行选择性的裁剪进而融入一个整合的框架，要么会产生一个表面整合、实则分裂的伪整合框架。与此相对，主张发展社会工作整合理论的呼声渐高，力图打破分裂的理论范式背后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立场，采取全象限、全层面的实务干预策略，开发具有内在逻辑的多面相实践框架。^⑥毋庸置疑，作为规范意义上、倡导性的社会工作整合理论与作为事实层面、实践性的整合策略之间充满了未知和距离，也就无怪乎很多反对或质疑整合理论的声音时而浮现。换言之，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取向的特殊性保持与普遍性包容之间始终存在着不可磨灭的张力。

2. 个体治疗与社会变革：实践介入层次的分野

一般认为，里士满（Mary Richmond）的《社会诊断》标志着社会工作通过诊断治疗回应社会问题的发端，亚当斯（Jane Addams）的社会介入为社会工作的行动与革新传统做出了卓越表率。起初，两种传统并行于社会工作专业化的轨道上，但伴随着20世纪30年代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范式的流行以及后来福利国家改革等形势，社会工作逐渐走向“去社会变革化”，专业化的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市场化的营利主义、管理主义的效率至上、个人主义中对个体自由和责任的强调都将社会工作拽向个体治疗的一端。^⑦尽管如此，社会变革作为社会工作的另一端面相并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其深深蕴含于结构性社会工作、激进社会工作、宏观社会工作、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的各种形式中，坚持不懈地发出使社会工作回归社会变革的呐喊。只是这种呐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充当着占据主导地位的个人治疗的“竞争性衬托”，受到了来自结构、文化和专业等方面的压制和排斥。

3. 问题为本与优势视角：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博弈

中国大陆社会工作的发展作为当代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产物应运而生。与最初风靡于西方社会工作的问题视角相似，国内社会工作发展之初也将回应和解决社会问题、充当社会安全阀作为自身主导性的专业使命。然而，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问题视角在西方社会工作情境中逐渐遭遇了来自优势视角的挑战。这也引发国内学术界对问题为本实务取向的反思，甚至一度掀起了“优势视角热”，凭借其强大的道义合法性影响了关于农村留守妇女、流浪儿童、流动儿童群体，

老年人、残障人士、精神康复、农民工群体，以及民族社会工作、矫正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等领域的理论与实践。当然学界也不乏对优势视角的再反思，比如警惕对优势视角的“拿来主义”态度，重视国内独特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语境，防止被社会工作机构异化和造成服务对象自欺的风险，以及优势视角导向下缺乏评估标准导致难以确认其效果。^④

社会工作发展中的问题化表征及其诊断

（一）“发展”表象下的裂痕：政社互动、运行模式与服务供给

随着政府职能转型、社会治理创新的进程加快，政府工作报告中数次提及发展（专业）社会工作的语汇，国家对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视可见一斑。从实践领域来看，近年来社会工作的专业化程度提升成为不争的事实。然而必须正视的是，当前我国社会工作发展仍然处于尚未成熟的阶段，这一阶段中政社关系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也是社会工作健康发展、良性发展至关重要的政治社会背景。我国政社关系既不内含于西方长久存在并假设的“国家-社会”对立的二元框架中，也未能达致政社关系的理想境界如亲密合作、平等伙伴的情形，而是出于一种相对暧昧的情状。第一，尽管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在资源配置和政策自主方面对社会组织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难以掩饰正式制度对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施加的基于资源依赖和政策控制方面的约制性作用，^⑤政府与社会工作者和社会组织之间异化成行政主导与资金依附、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化关系，^⑥街区的选择性配合、政社关系边界模糊成为人们不得不面对的现象。^⑦第二，政府职能部门与社工机构之间尚未建立完善的信任机制，购买服务的政策场域尚未理顺，政策试点的负面效应尚需控制。^⑧第三，民办社工机构在嵌入到社区过程中，尽管具有专业化优势但仍难以迅速克服“局外人”的身份劣势。^⑨

在此政社关系情境下，论者们观察到本土社会工作的运行模式具有典型的阶段化、非均衡、非协调、国家强势主导的“悬浮式发展”^⑩特征。首先，社会工作发展呈“依附-庇护”模式，知识转化不足、发展空间缺乏等问题暴露。^⑪其次，行政性和半专业化的运行模式至今仍然保持，专业自主性的缺乏表现在社会工作教育、伦理和薪资水平等方面。^⑫再次，当前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中存在专业主义霸权主导下的“证照化”的现象，而政府控制的证照制度却削弱了专业自主性^⑬，折射了目前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中评估标准的缺失和评估主体间权力关系的不平衡。作为社会福利资源的传递渠道，社会工作向服务对象输送福利资源的关键载体便是具体的服务供给，精心设计的活动是服务的外化。服务供给过程也被识别出诸多令人困惑之处。就服务中的关系来看，社会工作者难以满足主要利益相关方的需求，专业关系中甚至存在不平等的权力布局。就专业文化而言，本土社会工作界深感西方社会工作扎根本土文化的艰巨性，社会工作“知识分子”置身复杂的村落文化环境时感受到无知和无能。^⑭本土社会工作实践中也表征出五花八门的问题化服务样态，譬如在对待理论的态度上出现的“反理论”而不能正视并合理运用理论的现象，^⑮在实施具体服务活动过程中存在的“活动化”“指标化”“碎片化”“同质化”“选择性服务”“形式化”“效率优先”等异化现象。

从专业化角度来看，对服务供给过程中的过程和产出进行评价只是针对表象的描述，而对社会工作服务的专业评估应该是针对效果的评估。尽管当前国内学术界对社会工作评估进行的反思性总结有待加强，我们也看到实际操作中遇到诸多困境：在评估的具体操作中，规则不断改变、



量化标准过于烦琐、对行动者主体性考虑不足、第三方立场摇摆，充斥于原本为保证社会工作专业化而实施的评估过程。

（二）找寻症结：文化—结构—行动者的脉络

文化、结构和行动者三个层面成为本土学术界寻求问题症结的三个视角。社会工作从西方语境中伴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回应社会问题的需要而被移植入中国，第一时间的遭际正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本土文化之现实语境，因而文化敏感性成为本土社会工作的专业发展共识。然而，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中却偏重对理论和知识的接受和改造，重塑社会信任文化的努力远远不够，导致实务陷入重重困境。^②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中，之所以需要对本土文化进行某种程度上的重塑，主要是因为本土文化特质中的部分要素与源自西方的现代社会工作中蕴含的文化要素和假设存在一定的张力。与西方理性主义的、基于制度角色形成的信任型人际关系有所差异，我国的文化环境主要是基于具体的个人之间带有人情味的互动关系；与西方个体主义占主导的文化价值不同，我国文化脉络中彰显着深厚的集体主义价值情怀；与西方社会工作实践中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求—助关系不同，中国人的求—助关系更倾向于发生在熟人之间，其如何以适当的方式转化为西方意义上的专业关系是个文化难题；^③对习得西方语境下的社会工作知识的社会工作专业人士来说，更具复杂性的本土城乡文化环境对其知识库存构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④

如果说文化对本土社会工作的挑战是软性的制约，那么来自种种结构的力量对本土社会工作的约束和限制则显得相对强硬，在社会工作的批判性想象力的激发下，关于本土社会工作遭遇的结构性约制成为当前学术界的共同关注。其一，政社关系失衡是摆在国内社会工作发展面前不可忽视的结构障碍；其二，社会工作专业或职业本身所附有的模糊性以及如今形成的半专业化、市场化的发展表征社会工作发展模式的同时，反过来成为制约社会工作发展的结构性力量来源之一；其三，国内社会工作发展的体制机制尚未完全理顺，进而使得内生的科层制与外来的新管理主义组织文化同时加重对社会工作专业的制度性约束。当然，社会知晓及认可度的公众认知结构也是影响当前社会工作发展的结构性瓶颈，这一点也成为多年来业界达成的共识。结构与文化“软硬兼施”，为本土社会工作发展提出了诸多理论和行动难题。

与此同时，践行社会工作事业的行动者群体也表现出专业上的无力与无奈。一方面，社会工作行动者在对接政府、市场等主体时缺乏专业自觉性，对专业知识掌握得欠深刻、知识运用得欠灵活和实际干预中不够科学；^⑤另一方面，行动者在现行结构处境中难以充分发挥积极的自由裁量权，代之以消极的自由裁量权，专业和职业自主性缺失；^⑥同时，部分个体行动者选择了对专业化的“实践反叛”，逐渐背离专业而谋求现实利益。^⑦

尽管存在硬性和软性诸多约束，本土社会工作依旧迎难而上，尝试发挥社会工作行动者富有实践智慧的能动性、韧性和创造性，总体上采取了一种权变性策略：一方面有意识维系专业自主性，如采取“标准化案主”的方式优化社会工作技能教育；^⑧另一方面寻找不同程度、不同切入层面的体制“嵌入性”策略，如采取主动“示弱”、关系强动员、位置建构及采取集体行动等适应性策略。^⑨

多元建构：本土社会工作发展道路设计

转型期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的同时，也给国内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抛出了

诸多时代性难题，社会工作必须警惕市场经济可能带来的自由幻想、市场效率对社会生活的非人道化破坏；社会分层的表象分析对社会结构性两极化甚至断裂的关系，以及和谐稳定对日常生活中的迷茫和意义匮乏的掩盖。^⑧置身于既与西方语境有异又与传统本土社会有别的转型社会情境中，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探索显得尤为重要。关于“本土化”概念与隐含于其中的知识建构方式的合理性及其限度，学界观点基本上可以纳入一个介乎“西方中心主义或文化殖民主义”^⑨和“中国本土对西方社会工作的渐进性习得”之间的谱系。就修辞而言，当前本土社会工作的讨论范畴中“本土化”与专业化等依然是核心范畴之一。

关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论设想很多，涉及总体性的结构性设想、关系层面的设计、行动者层面的倡导、整合模式的发掘以及其他创新性的命名。就结构性设想而言，本土化的“社区为本”（community-centered）倾向于将社区本身作为一个具有多面性的关系主体被重新置于社会工作服务的中心；^⑩尝试重建个体与社区之间的公共性联结；^⑪重拾资源公平分配的价值观并与原有的本土社会工作结盟从而避免被动嵌入导致的专业权力式微局面。^⑫

从关系重设的角度来看，冲出当前本土社会工作发展困境的超越路线，比如重构政府、机构等主体与社会工作者的关系，让社会工作在与这些主体的直接对话和情境性建构中确立“遣使者-受任者”之关联；^⑬重构专业关系，依循“批判诠释论”的范式，重塑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平等合作、沟通理解的良性互动关系；^⑭重构社会关系，在自我、他人与情境三个层次之间实现最大限度的和解，进而搭建一个综融性、整合性的行动框架；^⑮重构中西方知识体系位置关系进而超越单向度的本土化。

本土化道路也强调专业的反思性，提升本土社会工作的“理论自觉”和批判意识，充分挖掘本土实践智慧，开辟介于政府体制与市场中间的独立专业领域，构建专业知识体系，增强专业自主性。有论者倡导以一种实用主义、情境化的、临时性的、耦合性的态度发展“探寻-行动研究”，在理解行动意义的基础上，对主观行动受到的客观场域结构限制进行反思性掌握，并开展试探性的行动，进而实现特定情景下的一种权宜有效性。^⑯

此外，整合模式作为带有超越性、综融性的本土化发展道路也受到学术界的青睐，如基于生态系统等总体性理论的整合模式，对当前分立的社会工作理论范式与实务取向进行全层次、多角度的整合以及对西方盛行诸种论辩的整合等。最后，随着生态环境的严峻形势，网络化、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的兴起，经济理性对人的存在方式的日渐主导等时代趋势的新近演化，一些新提法涌现出来，譬如绿色社会工作、“互联网+社会工作”模式以及对人工智能挑战的讨论。

展望未来：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批判性视野

批判性本土社会工作研究呈现出的“论辩、问题与道路”，表面上看似乎属于关联不甚紧密的三个分立的主体，但实际上三者之间却内含着互构性的逻辑关联（见图1）：充满争鸣性、多元性的理论论辩，恰好是社会工作理论发展过程中的标志性痕迹，其背后蕴藏着不同社会思潮和理论流派之间的竞争性分野与合流；本土社会工作实践中暴露的诸多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理论上特殊性与普遍性、实证主义与解释主义、科学与艺术、专业主义与管理主义、个体治疗与社会倡导、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等二元理念之争的反映，其作为“论辩之镜”是歧象丛生的众多专业理念角逐的关键场域，对实践问题的批判性诊断的依据和立场往往来自不同的专业

理念，其本身也凸显了隐藏在理念层面的二元认识论之争背后的本体论的矛盾，即现实生活中人与社会的二重性；关于专业本土化的道路建构实际上属于专业共同体施展的想象空间，同时具备理论与实践的维度，诸道路想象必然是基于设计者所认可和坚守的理念及亲历的实践（及其所处情境）所生成，尽管其表征具有明显的虚构或非现实成分，但终究属于凝结了理论信念与实践的感知和反思的产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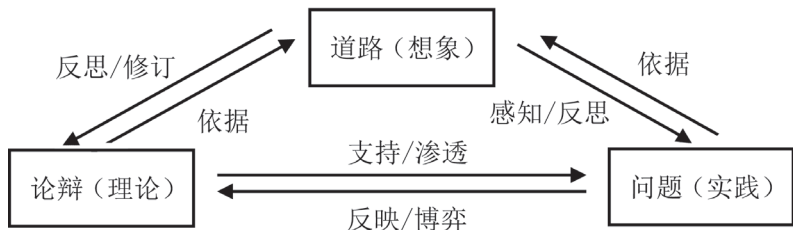


图1 批判性本土社会工作研究三个议题的关联

（一）对本土社会工作批判性视野的“二次批判”

通过学术界关于本土社会工作的批判性思考，可以感受到本土社会工作学术界始终铭记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对专业的质疑，注重社会工作理论性、学术性的彰显，敏感于绵延社会工作发展史的诸多理论论争及其专业化进程中的诸多不足。在从本土实践中自下而上诊断发展裂痕并归因的过程中，社会工作不仅是批判性反思的对象，也被视为观察本土社会制度与文化的切入性工具。换言之，本土社会工作的批判性视野同时赋予了“社会工作研究”以本体论和方法论的意义。通过对本土社会工作发展道路的探索和憧憬，隐约可见中国特色社会工作或中国社会工作知识体系构建的可能性，有意识地走出“输入-输出”式单向互动，主动参与全球社会福利事业建设，同时设法进行实践性知识框架下的本土化专业建构。^⑥

然而，既有的批判性本土社会工作研究仍然存在可供“二次批判”之处。第一，国内社会工作的基本论辩主要还是对西方理论论争的观望和重复，源自中国本土文化或实践中的论辩提炼还比较缺乏，其中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之间的博弈依然居于主导，证据为本与非直接证据研究之间的对峙即为一例。第二，对发展问题的诊断关注到了本土政治、文化、社会的特殊情境，却在某种程度上疏忽了与国际社会工作问题化表征的比较与对话，能够戳穿表象透视问题实质的研究仍属凤毛麟角。第三，当前对问题的归因取向往往强调局部侧面，有待探索一个整合性、总体性的解释框架。第四，就目前专业发展的现行策略及发展道路设计来看，需认识到并没有哪种策略放之四海而皆准，应进一步斟酌不同策略适应的特定情境，而非概而化之。或许正是本土社会工作批判性视野发展上的劣势，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当下中国社会工作高质量研究不多，独立的专业研究范式和研究议题难以生成，至今仍停留在“低水平重复研究阶段”。^⑧

（二）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本土社会工作批判性思维的旨归

源于心理学认知理论和哲学理性理论的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在西方社会工作界受到重视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被视为社会工作教育的核心目标。1991年西利格提出“批判性思维”这一概念并将其作为回应“社会工作者如何思考”这一问题的最好方式。关于社会工作批判性思维究竟是旨在促生理论理性（theoretical reasoning）——着眼于正确地解释与预测，还是实践

理性 (practical reasoning) —— 正确地行动, 基本达成共识的是西方社会工作者普遍倾向于其属于实践理性的范畴, 即回答“人们应该怎样做”。然而, 在以实践理性作为目的这一共识之下亦不乏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张力, 即社会工作究竟是强调行动决策中尽可能避免 (逻辑) 错误还是注重对专业价值的恪守?^①实际上, 事实与价值这对张力正是社会工作中理性科学与人文艺术理念之争的一种外化。

当实践理性主导的批判性思维在西方社会工作界占据主导地位时, 本土社会工作批判性思维又应作何构型? 迈向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 应该作为本土社会工作批判性思维的发展方向。第一, 从专业发展历史来看, 我国专业社会工作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与西方一个世纪悠久的历史在理论上的积累与沉淀之间的差距不言而喻, 可以说西方社会工作已然取得了若干重要的理论突破, 而我国社会工作却仍处于对西方理论加以学习和反思的初步阶段, 因而对理论理性的追求或理论自觉的动力有助于本土社会工作在理论上的崛起。第二, 从专业发展现实来看, 如果理论上依旧延续全球或西方叙事而实践中的问题却局限于本土情境, 这般“割裂化”的理解必然可能导致我们视野的矮化和隘化。第三, 从专业嵌入的具体情境来看, 我国在政治制度、社会组织、文化氛围、经济体系等各个角度都存在与西方社会工作的显著分殊, 这也正是社会工作研究中的西方与非西方视角分歧的根源所在。

进一步, 当前作为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合体的本土社会工作批判性思维有哪些可能性指向? 首先, 指向情境。延展社会工作想象力, 增进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和历史过程的探索。比如, 反思社会工作发展所处的“加速社会”情境及其专业应对。中国社会工作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应运而生, 技术加速、生活节奏加速与社会变化加速形成“自驱循环”^②, 包括社会工作在内的社会各个领域被裹挟进入剧烈竞争性的环境, 表征出明显的“效率主义”并外化为诸种问题化现象。其次, 指向组织。跳出法团主义与市民社会二元对立框架, 既看到社会组织在国家与社会关系层面的意义, 也尝试观察组织内部运作的规范机制和实际操作情形及其与外部其他组织间的关联, 同时看到组织中个体的行动框架和实践事实, 进而在实践中充分考量这三重维度。再次, 指向互动。脑 (认知) 与心 (情感) 是内生于社会工作专业和职业的两极, 批判性思维既要本着理智的态度去洞察社会工作者及其利益相关主体互动过程中内涵的权力关系、意义诠释, 又不能忽视社会工作作为非商业化情感劳动 (emotion labor) 的一极, 如何在规范性的情感体制 (emotional regime) 之下进行合适的情感整饰, 情感整饰与专业化实践之间的关系仍待探索。

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批判性视野不仅着眼于已逝的过去、跃动着的现在, 更眺望至未知的将来, 并竭力将过去、现在与将来等时间维度整合进一个独特的“本土”空间向度。只有始终将与时俱进、批判反思作为本土社会工作的价值追求、理论自觉与实践担当, 才能在构建中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进程中兼顾全球化视野和本土化情怀, 真正迈向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本文系《探索与争鸣》第三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获奖论文。]

注释:

① 迈克尔·沃尔泽:《阐释和社会批判》,任辉献、段鸣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2—43页。

②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的“本土社会工作”指的是在我国社会情境下进行本土化过程的专业社会工作:从时段来说,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内地社会工作教育恢复重

建,发展于2006年《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之后;从性质来看,其受到西方社会工作知识体系较大影响,而非纯粹内生于中国文化历史背景下的传统民间慈善活动,亦非传统的行政性国家福利事项;从参与人员看,其囊括了相关体制决策人员、理论工作者或教育者及广大



实务人士这一专业社会工作发展共同体。

- ③ 文军：《论社会工作理论研究范式及其发展趋势》，《江海学刊》2012年第4期。
- ④ 刘艳霞：《断裂与弥合：社会工作研究中科学主义范式与人文主义范式的反思》，《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 ⑤ 田蓉：《新管理主义时代香港社会福利领域NGO之发展》，《社会》2013年第1期。
- ⑥ 文军、吴越菲：《超越分歧：社会工作整合理论及其应用》，《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 ⑦ 李伟：《社会工作何以走向“去社会变革化”——基于美国百年社会工作史的分析》，《社会》2018年第4期。
- ⑧ 陈友华、祝西冰：《中国社会工作实践中理论视角的选择——基于问题视角与优势视角的比较分析》，《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
- ⑨ 徐盈艳、黄晓星：《促成与制约：制度嵌入性视角下的社会组织发展——基于广东五市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实践》，《新视野》2015年第5期。
- ⑩ 费梅苹：《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中的基层政社关系研究》，《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 ⑪ 黄晓星、杨杰：《社会服务组织的边界生产——基于Z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研究》，《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6期。
- ⑫ 戴香智：《契合与张力：社会工作机构能力建设的场域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0期。
- ⑬ 周艳、张国平：《社区社会工作的主体选择：社区居委会与民办社工机构的定位及关系分析》，《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 ⑭ 侯利文、徐永祥：《被忽略的实践智慧：迈向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新方法论》，《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 ⑮⑯ 张大维、赵彦静：《“三社联动”中社会工作的专业缺位与补位》，《中州学刊》2017年第10期。
- ⑰ 彭华民：《中国社会工作学科：百年论争、百年成长与自主性研究》，《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
- ⑱ 朱健刚、童秋婷：《反思社会工作的“证照化”》，《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 ⑳㉑ 古学斌、张和清、杨锡聪：《专业限制与文化识盲：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中的文化问题》，《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6期。
- ㉒ 文军、何威：《从“反理论”到理论自觉：重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
- ㉓ 彭小兵、王雪燕：《关注价值、重拾信任：再论社会工作本土化》，《云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 ㉔ 王思斌：《中国社会的求-助关系——制度与文化的视

角》，《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

- ㉕ 黄晓星、熊慧玲：《过渡治理情境下的中国服务环境：基于Z市社会工作服务的研究》，《社会》2018年第4期。
- ㉖ 吴越菲：《社会工作“去专业化”：专业化进程中的理论张力与实践反叛》，《河北学刊》2018年第4期。
- ㉗ 臧其胜：《标准化案主：社会工作临床技能教育的新策略》，《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2期。
- ㉘ 张超、朱俊瑞：《社会组织合法性的双重面相及其生成逻辑——基于杭州6家“引领型”社会服务组织的分析》，《浙江学刊》2018年第1期。
- ㉙ 郭伟和：《转型社会背景下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战略选择》，《思想战线》2011年第4期。
- ㉚ 刘威：《“一个中心”与“三种主义”——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再出发》，《中州学刊》2011年第3期。
- ㉛ 吴越菲、文军：《从社区导向到社区为本：重构灾害社会工作服务模式》，《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 ㉜ 徐逸国：《从专业性、本土性迈向社区公共性：理解社会工作本质的新线索》，《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8期。
- ㉝ 朱健刚、陈安娜：《嵌入中的专业社会工作与街区权力关系——对一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个案分析》，《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1期。
- ㉞ 陈涛：《社会工作专业使命的探讨》，《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6期。
- ㉟ 张良广：《“批判诠释论”视角下的“争吵”事件：一个国际项目实施中的冲突与转向》，《社会》2010年第3期。
- ㊱ 文军、高艺多：《关系重构：社会工作实务取向的分歧根源及其超越》，《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5期。
- ㊲⑳ 郭伟和：《如何进入社会工作内部进行实践研究——一个非激进的专业实践研究大纲》，《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 ㊳ 安秋玲：《实践性知识视角下的社会工作本土化建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 ㊴ J. Mathias, “Thinking Like a Social Worker: Examining the Meaning of Critical Thinking in Social Work. *Journal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Vol. 51, No. 3, 2015, pp. 457-474.
- ㊵ 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编辑 李梅